

伍加伦 著

四川現代作家研究

沙河題



责任编辑：陆文璧

封面设计：冯先洁

封面题字：沙汀

四川现代作家研究

伍加伦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0.56 字数：220千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5614—0307—0/I·50 定价：3.80元

《四川现代作家研究》序

沙 汀

与这本书的作者伍加伦相识，回想起来，是在几年前。一次，他和一些同志在“菱窠”见到我，摆谈当中，谈到文学评论界、研究界对我们四川的一个重要小说家——李劫人，评论、研究不够，这对现代文学，四川文学，都是一个重大损失。他说，他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在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只不过不知将来收获怎样。

从这个集子看，加伦同志的工作大有成效，收获颇丰，可以不致愧对四川文学先辈了。

的确，四川现代作家曾经给中国新文学做出过巨大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开创“五四”新诗歌的，就有我们的郭沫若、康白情不可磨灭的功绩。开创“五四”新小说，发展新小说的，就有我们的李劫人。李劫老在开创方面的功劳，以前不太为人注意。我想，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的创作和生活，主要是在四川，成都，而新文学的中心，一是北京，二是上海，所以介绍得不够吧。其实，李劫老的长篇、短篇都很富乡土气氛。因为，他写四川，主要是写川西坝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并且巧妙运用四川方言，读来更加亲切。所以，郭沫若同志才称赞他的小说，是现代的《华阳国志》。另外，在三、四十年代，巴金的小说，周文的小说，艾芜的小说，都程度不同地对当时文坛起过影响。我的小说创作，主要收获也是在这个时期。如果再说近一些，建国以前，阳翰

笙的戏剧，尤其是他那些历史题材的话剧，到建国后郭沫若老人的《蔡文姬》等优秀历史剧，以及八十年代自贡魏明伦写的川剧《巴山秀才》，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引起过文艺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还有，我们四川土生土长的后起之秀周克芹，他的长、中、短篇在全国的小说评奖中，都榜上有名。因此，可以说四川文学理应在国内外发挥较大影响，值得由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给予更大更多关注。也因此，伍加伦同志在研究四川现代作家、四川现代文学上所做的努力，就更值得肯定，值得赞扬了。

四川现代作家的成长，大约都离不开两大营养：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文学的影响，二是国外文学、文化的影响。郭沫若、李劫人、巴金，都是这样。一方面是他们有相当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这为他们创作中始终保持中国特色，有民族文化的根基，作了保证。另一方面，他们都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面包，对国外文学，尤其是近现代国外文学有广泛的接触，具备把它们“拿来”为我所用的条件。郭沫若的诗歌，受国外近现代诗歌影响十分明显。就是李劫人的小说吧，表面看来尽是方言土语，写成都写川西坝的事，如数家珍。实际上，他的小说在创作方法、结构的安排上，所受法国文学的影响相当突出。正因为这样，郭老才说李劫老是“中国的左拉”。在借鉴国外文学这一点上，不但后起的作家要向郭老、李劫老他们学习，就是今天从事文学评论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藉以获得一种广阔的胸怀，一种消化吸收能力。我觉得，加伦同志已经有意识地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并且已经取得显著的成就。因此值得我们祝贺。

当然，值得研究、应该研究的四川作家，远不只这本集子涉及的几位。四川古来就是人才辈出的地方，现当代更是出了许多革命者，文化人，作家。四川的文学的优秀传统，四川现当代文学的可喜收获，都该进行整理、研究。四川现代作家的有关资料，由于过去地方长期内战，加上后来“十年动乱”，毁坏、散失了不少，现在必须赶快抢救，赶快研究。从这个角度说，这本集子也很具有开拓意义。而且，我相信加伦同志将来还会取得更多的收获，更大的成绩。而这一册《四川现代作家研究》则预示我的期望不致于落空。

1989年12月4日于四川省人民医院

目 录

序.....	沙汀 (1)
四川新文学之我见.....	(1)
论郭沫若的“人民文艺”观.....	(19)
论郭沫若的悲剧观.....	(38)
郭沫若的戏剧艺术从这里开始.....	(57)
——浅析儿童歌剧《黎明》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系列历史悲剧的发端.....	(66)
一首形象美、心灵美的抒情诗	
——论郭沫若历史悲剧《虎符》.....	(77)
《高渐离》——血与火的交响乐.....	(95)
一部形象化的四川保路运动史	
——郭沫若传记文学《反正前后》琐谈.....	(115)
郭沫若与惠特曼.....	(129)
中国现代社会的变迁与郭沫若的文化意识.....	(147)
李劫人小说的历史地位.....	(165)
他呼唤着新小说的诞生.....	(176)
——关于李劫人“五四”前的白话小说	
试论李劫人小说的艺术特色.....	(196)
李劫人与法国文学.....	(226)
李劫人传略.....	(240)

略论巴金的中篇小说《憩园》	(281)
艾沙比较论	(293)
五四时期吴虞文化观的反思	(312)
后记	(328)

四川新文学之我见

如果我们把“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比做一幅鸿浩的万里长江图，当对它作了宏观的鸟瞰之后，仍然觉得兴味不尽，还要对她的各支流，各地域的风光分片分段地进行细细的观察、欣赏、品味，这样或许更能看出整个新文学的全貌和特色，优劣和长短。

开展地方区域文学的研究，无疑是一项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工作。这种研究是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它有利于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源和流，它们的整体面貌，以及它们各自的特色和风格，规律和价值。这里，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我对四川新文学的看法。这看法，只是一得之见。

一、四川新文学的启蒙和呼唤

自古“天府之国”出文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含章而挺生”，奠定了蜀中文学基业；唐代李白，一代诗仙，名扬华夏；宋代三苏父子，一代文豪，风流不尽；明代杨慎，天才英发，著述如林；到了现代，郭沫若、李劫人、巴金，蜀中才子，文学精英。他们是“江汉炳灵，世载其英”，乃所处时代文化高峰的代表，是四川文学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文学的光荣和骄傲。

俗话说“物穷则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文学在它

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包括文学的延续性、继承性和变革性。但是其变革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由一种封建的旧文学向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转换，不可能一蹴而成，更不能一触即发，必有其内在的动因，和外在的动力，前期的酝酿和社会变革的推动，是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四川新文学的滥觞，和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是处在同一个历史层面上的。在这个层面上：一个是外来新兴科学的引进，民主思想的启蒙，及其文学自身的呼唤，这是前期的酝酿；一个是现实历史条件的准备和时间的选择，即社会变革引出的推动力。

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导火线。它既是新思想的大传播，又是一场社会的大变革。革命前后，四川三千留日学生学成归来，使僻处西陲的四川传播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风气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势头。四川第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是邹容。他的《革命军》问世，好象雷鸣前的闪电，引出了辛亥革命惊天动地的雷声。这雷声，犹之如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给予四川爱国志士以亘古未有的激励和深刻的启蒙，推动了四川民主革命运动的迅速展开，同时也推动了封建的旧文学向现代的新文学开始转换和变革。

四川辛亥革命后，最先出现的文艺期刊怕要算是1913年在成都创刊的《文艺周报》，它开始倡导白话文学。然而最能体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的文艺性刊物则是1914年7月15日在成都创刊的《娱闲录》。刊物主办人樊孔周，他是四川商会总理，四川新文化最早的倡导者和鼓吹者，1918年被四川军阀刘成厚枪杀。这家杂志的内容有滑稽小说、家庭小

说、短篇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纪实小说、诗歌、剧本等。其文艺宗旨，表面看来，似乎是一种消闲性的刊物。究其实质，其实不然。其基本倾向是注重写实，抨击时弊，娱而不闲，闲而不娱。其中有大量的作品表现为“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对于相逼而来的天灾人祸表现出“扼腕而太息，愀然而深悲”的情绪。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四川新文学萌发时期的作家曾孝谷、李劫人、曾兰、吴芳吉等，他们的创作对四川新文学的诞生已经发出了强烈的呼唤。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曾孝谷（曾安素、名延年）早在1905年在日本与李叔同、欧阳予倩等共同创建了“春柳社”。他根据美国女作家斯托活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为五幕新剧《黑奴吁天录》，点燃了中国话剧的第一把火，成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发端。李劫人的白话小说出现在新文学的启蒙和倡导时期，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具备了现代小说的若干特征。如1912年写的《游园会》，是一篇与鲁迅《怀旧》相似，反映辛亥革命失败的作品；发表在《娱闲录》上的《夹坝》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的丑恶本质；《儿时影》抨击了封建的教育制度。这些小说，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章回小说的俗套，开始采用插叙、倒叙、补叙、第一人称、心理描写等西洋小说艺术手段的某些长处。李劫人在鸳鸯蝴蝶派的包围之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以清新、健康、写实的风格，勇于革新的精神出现在四川新兴文坛。吴虞妻曾兰（香祖）也是四川新文学运动启蒙的女作家。他是南社成员，曾任《女界报》主笔。先后在《女界报》、《娱闲录》、《新青年》、《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剧本多篇。1914年

发表在《娱闲录》上的短篇小说《孽缘》，描写封建包办婚姻给妇女造成的悲惨遭遇。同年10月又发表在上海《小说月报》第6卷第10号上。这篇小说用白话写成，颇有情致。

《小说月报》编辑主任致信作家，称小说“叙事明晰，用笔犀利”，“间有力透纸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四川新文学的一株萌芽。白屋诗人吴芳吉继承了黄遵宪诗歌改革的道路，在西洋诗歌，特别是英国诗人彭斯的影响下，进行了新诗创作的大胆尝试。在诗歌形式上主张句式长短不茸，随其自然，提倡口语入诗，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吴芳吉理想的这种新派之诗，既非西化之诗，亦非传统之诗，而是从古典诗词与民族形式中蜕变出来的“国风派”诗。从1916年开始，写了大量的这种长短句新体诗，《婉容词》是其中的代表。吴芳吉是四川（也可以说全国）新旧诗递嬗环节上的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短句白话新诗也就成为旧体诗向新诗过渡的一座桥梁。

当然，曾孝谷、李劫人、曾兰、吴芳吉等作家的诗歌、小说、戏剧作品，仅仅是新文学诞生前的一种雏型，一种最初的尝试。且不说成功与否，就这些作家们对新文学的渴望和创作的努力，以及他们的作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强大的新文学的潮流。在历史潮流的必然进程中，他们以自己的作品，热烈地呼唤了四川新文学的诞生！

在四川新文化思想的启蒙和四川新文学诞生的呼唤中，吴虞是一个不可忽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早在1910年，吴虞在《蜀报》上发表的《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中，就提出过要大胆批判“钜束言论”、“禁锢思想”的儒家学说，以“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倡导新思想、新言

论。吴虞是《娱闲录》的积极支持者和主要撰稿人，1914至1915年间，在《娱闲录》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和文学评论文章。如《爱智庐同曾香祖玩月诗序》、《〈骈文读本〉自序》、《邓寿遐〈灯赋〉序》、《复王光基论韩文书》、《〈圆明语〉序》、《请褒扬黄君文翰文》等表示了他的文学观。《松冈小史序》（又题为《刘长述〈松冈小史〉序》）一文，从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论到当前社会流行的欧美小说。文中他对小说的地位和功能作了正面的肯定，认为小说之有“伟大的功用”，在于它可以起“潜移世人之思想，纳绪进化之途，易俗移风”的作用。指出小说的社会功能，“其势力远过于六经”，小说的价值是“文学与美术之精华”。当时吴虞已经看到今日之为小说者，乃“师欧美之长”。小说“师欧美之长”，不仅是吴虞的主张，而且当时的小说，如李劫人、曾兰、刘长述等人的创作中已有所体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吴虞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5年）、《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1916年）等有名的反孔非儒文章，对封建礼教、宗法、伦理道德进行尖锐的批判，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倡导“新思想、新言论”，主张学术应当进行“辩论”和“竞争”。这在当时思想被禁锢，言论被钳束的四川，无疑是一剂强大的新思想的启蒙，对于新文学的倡导，乃至诞生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四川新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在四川，时代找到了它需要

的新文学，新文学也找到了它需要的时代。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振奋了一个民族的意志，唤醒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诞生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刚刚在北京初春的土地上滥觞的“五四”新文学，对于遥远的四川，“无异黑暗漫漫当空，露出了一线光明”，新文学的浪潮象电流一样通过雪练似的长江，迅速地扩散到“天府之国”的成都。《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晨报副刊》等报刊源源流向成都，成为向四川传播新文学的主要工具。为了在闭塞落后的四川传播新思想，把正在萌动中的四川新文学推向前进，1919年7月，李劫人等在成都创办了《星期日》周刊。该刊除开展新文化运动，“尖锐地批判旧制度，热烈地传播新思潮”外，特设了《文艺界》专栏发表新文学作品，如叶伯和的新诗《三十年前做孩子的事情》、静穆的小说《可怜的强盗》等。刊物还发表了李大钊的《什么是新文学》、阐述了新文学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同时，也发表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吴虞的《说孝》等政论文章，竭力倡导社会革命学说，狠批孔孟之道，为新文学在四川的兴起与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特别要提到的是，吴虞在读了鲁迅小学《狂人日记》之后引起了强烈的思想共鸣，在《新青年》6卷6号（1919年10月）上发表了《吃人的礼教》，对小说《狂人日记》以很高评价。吴虞说：“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他呼吁民众应觉悟，应该明白：“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吴虞自己就是被礼教吃过而奋起反封建礼教的人，他以自己的体会和心得，为四川新文学工作者指明向鲁迅学习，走鲁迅

的道路，从而对四川新文学诞生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另外，“五四”时期，还有邓奎皋主编的《威克烈》(Weekly)，王光祈、吴芳吉、康白情等发起在北京出版的《新四川杂志》，袁诗尧主编的《四川学生潮》，巴金主编的《半月报》，秦德君等主编的《直觉》(纯文艺刊物)，肖楚女担任主笔的《新蜀报》，王右木主办的《人声》等刊物都以相当的版面发表新文艺作品，大力宣传、倡导、鼓吹新文学运动。同时新文学团体，如成都小露文学社(1922年9月)、成都戏剧协社(1922年8月)、草堂文学研究会(1922年11月)等也应运而生。小露文学社出版刊物《小露》，其特刊“诗歌号”主张“应当创造新的独有的为艺术的艺术去督促人生，而不能为现实人生或人生底忌讳或社会的嘲笑去抹杀自己创造底伟大天才！”。同时，他们也反对“无病呻吟或矫揉造作”的作品。戏剧协社在《四川日报》上开办《戏剧》副刊，由王怡庵主编。草堂文学出版的《草堂》文学性季刊，可以说是四川新文学运动初期最得力的纯文学刊物，主要内容有诗歌、小说、戏剧。该刊发行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长沙、云南、贵州，及南洋、日本、法国等地。周作人发表了《读草堂》的评论文章，说：“近来见到成都出版的草堂，更使我对于新文学前途增加一层希望”。郭沫若在日本看了《草堂》第一期后，给“草堂社诸乡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奉读草堂月刊第一期，甚欢慰。吾蜀山水秀冠中夏，所产文人在文学史上亦恒占优越的位置。”还谈到文学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关系，说：“近代文学的精神无论何国都系胎于自然主义。”

在“五四”新文学的高潮中，活跃于创造社的郭沫若、

邓均吾，少年中国学会的周太玄、王光祈，新潮派的康白情，文学研究会的赵景深、赵铭彝，《晨报·副刊》主编、民众戏剧社的组织者蒲伯英，以及稍后一些时间活跃于“沉钟”、“浅草”社的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等全国著名文学新人及其领袖人物，与战斗在四川的新文学的启蒙者、发动者李劫人、叶伯和，草堂文学社等文学团体一起，共同孕育、创造了四川的新文学，并推动和发展了四川的新文学。

由于四川地处西陲，地理环境比较闭塞，与西方文化交流相应地要缓慢、薄弱些，因此四川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作品直接产生于本乡本土的不多。但由于蜀中坚实的文化基础，和肥沃的文学土壤的孕育，郭沫若等文学精英，新文学的创造者们，当他们冲出三峡，吸取了异域的文化营养后，便很快创造出了异想不到的成果，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乃至在“五四”时期全国的文坛上居于领先的地位。

首先是白话新诗的创作。郭沫若及其领导的创造社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异军突起”。他的《女神》是一部划时代的新诗集，有其杰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康白情的《草儿》，仅次于《尝试集》和《女神》，和俞平伯的《冬夜》齐名。他在“五四”前后与胡适、刘半农、俞平伯一样，是新诗（又叫白话诗或者白话自由诗）的主要倡导者。他的新诗论著《新诗的我见》一文，对新诗产生的原因，什么叫新诗，新诗的特征、功能、效用及其新诗的内容和题材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探讨，在新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白情的新诗独具特色。他的诗被称为放纵自由的白话诗，是“新文化运动随着群众的呼声”，“是剪裁时代的东西”，是“五四”时期爱国青年激越的呐喊，是学生运动的历史剪

影。他的语言形式比胡适的《尝试集》解放得多，彻底得多，是四川作家继郭沫若之后对“五四”白话自由诗运动的又一突出贡献。

另外，吴芳吉、叶伯和、周太玄、王光祈、邓均吾、赵景深等四川新诗人，在“五四”新诗坛各自成派，占有一定地位。吴芳吉1919年秋，在上海任《新群杂志》诗歌编辑，因发表《小车间》、《两父女》、《婉容词》等新歌体诗而名声大振。他主张“读外人之诗，断非诋外人，乃利用外人之诗以改良吾诗。”吴芳吉的新歌体诗是诗的改良派，而非革命派，在新旧两派的夹击中被诬为“非驴非马”之作。因此，他于1920年怒而退出了诗坛。后来成为“学衡派”成员，站到新文学的对立面去了。周吾（太玄）是“少年中国”派的代表，他主张“诗是主情的，是想象的，是偏于主观的”。他虽然最先翻译了凡尔勒仑的诗歌，然而他的诗“颇有泰戈尔风”，极富抒情色彩，意境深远，韵味悠长。

“五四”时期的小说仅次于新诗的地位。1919年二、三月间，郭沫若创作的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牧羊哀话》具有开派的风气。李劫人1922年在法国写的中篇小说《同情》以最先描写法国人民生活，充满了异乡情调，而成为四川新文学中最早的成就之一。此外，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金满城等作家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流传于世的好作品。

再看“五四”时期的戏剧。蒲伯英和郭沫若是“五四”新文学剧坛两位重要而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不仅倡导戏剧运动，而且有剧本问世。蒲伯英最大的贡献是从事于传统戏向现代戏的改革，大力倡导白话文学和大众文学。他提出的“艺术要自由创造”、“教化的艺术”等现实主义艺术理

论，以及“以民众的精神为动力”的戏剧改革思想，在中国戏剧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评论方面，四川作家也占有突出地位。如郭沫若的《诗论三札》、《论节奏》、《生命的文学》；蒲伯英的《戏剧之近代意义》、《中国戏剧天然革命的趋势》；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周太玄的《诗的将来》；李劫人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李思纯的《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等论文都有新的主张和理论建树，在当时四川乃至全国文坛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在西洋文学的译介方面，四川作家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郭沫若之于德国文学，李劫人、李璜、敬隐渔之于法国文学，赵景深之于俄国文学，吴芳吉、周太玄之于英美文学，对四川的新文学运动有过直接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总之，“五四”时期巴蜀文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文学活动，文学主张，文学创作，在当时全国文坛占有明显的领先的地位，显示了巴蜀文化的优良传统、深厚坚实的基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拓精神；出现了一批有地位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光荣历史做出了可喜的一份贡献，而成为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部份。郭沫若、李劫人等文学大师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到了三十年代，一批勇敢冲出盆地的青年，他们在“五四”乳汁的直接哺育下，崛起为新的四川作家群，在中国的新兴文坛再展巴蜀雄风。他们是小说家：巴金、沙汀、艾芜、刘涓清、周文、罗淑、邵子南、刘盛亚、王余杞、陈铨等；诗人：朱大枏、何其芳、覃志豪等；戏剧家：赵铭彝、阳翰笙、章泯、李伯钊等；理论家：李初梨、任白戈、洪毅